

责编 姜晨怡

倾听科技前沿的权威声音,领略第一生产力的无限前景

你说·我说

文·王海鹰

不能任由“假日拥堵”“堵”下去

刚刚过去的长假,给人“添堵”的新闻不少:九寨沟景区发生游客滞留事件,上下山通道陷入瘫痪;杭州西湖断桥客流量爆棚,整座古桥只见人影不见桥面;还有长城、故宫、三清山……有网友在微博上慨叹,到处是“人山人海”,豫园的人比包子还多,连法海都被挤到西湖里去了。

一个长假就让各地露了“怯”。从1999年国庆节第一个黄金周以来,假日景区拥堵就不断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十多年过去了,假日景区拥堵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反而又加上了高速公路拥堵。在

高速公路上散步、遛狗、健身的新闻屡屡发生,撞击着人们的眼球。

国家旅游局在这个假期内曾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当景区游客可能达到最大承载量时,要果断采取有力措施,按照预案要求,加强游客流量控制和疏导,避免发生大的问题。并提出各旅游景区“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认真有序地做好各项服务和管理工作,防止发生大面积游客滞留和重大旅游安全事故”。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一通知得到有效执行。听

任拥堵不治,反映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情政”思维和唯利是图的心理:拥堵,只要不出人命,就事不关己。对地方政府和景区而言,人来得越多越好,来得越多,门票卖得就越多,收入就越高,全不管黄金周已然变成了“黄金周”,而游客的旅游收益大打折扣。

拥堵不是不治之症,只要肯用心,是有招可寻、有法可治的。我们欣喜地看到,有些地方正在积极探索应对措施,比如,上海今年在外滩发明“开关式”过马路,由民警组成人墙控制人流,效果明显。

当然,这仅是治标之策,还有更多治本之举亟待

推开,比如强制推行带薪休假制度,缓解长假集中出游压力;比如建立全国统一的预警机制,像天气预报一样每天发布各景区“人气指数”,预估客流数据,提前调节客流量,等等。

根治拥堵是群众呼声,也是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听任拥堵,则是漠视群众利益。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国铺开。真心希望各地政府和景区,把解决拥堵作为践行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的切入点,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拥堵问题。人们不愿再看到长假拥堵一年一年成为常态。

一周传声

群众关心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既不能回避,更要研究有效办法彻底解决。

——9月中旬,工商总局党组集中三天时间对33条意见建议进行了逐条查摆分析。党组书记、局长张茅在发言中指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关乎6000万市场主体、13亿消费者切身利益。

根据工商总局党组要求,各单位迅速行动起来,就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对号入座”,从群众感受最直观、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改起

——竞争执法局在全国范围开展不正当竞争专项治理行动,严厉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医药购销、医疗服务、择校升学等领域商业贿赂行为;市场监管司针对金融、电信等行业“霸王条款”易发、多发、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集中开展规范整治工作;商标局针对撤销三年未使用注册商标审查期限较长等社会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企业注册局积极研究放宽工商登记相关条件,缩短网上名称预先审核时间……

“真是太好了!”

——今年9月,广东肇庆市封开县青年宾某因一次车祸造成凹陷性骨折,在封开县当地住院一个星期后转运至临近的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虽然梧州医疗条件较好,但宾某的家属却一直在担心医疗费用吃不消。当医务人员告诉他有封开县医保的患者也可以报销时,宾某及其家属感慨万千。

广西东部的梧州市与广东西部的肇庆市山水相连,两市地处粤桂合作前沿。据介绍,目前双方已经建立“双向绿色转诊通道”。今年前8个月,梧州市工人医院接收33位从封开县人民医院转诊过来的病人,同期也有5名患者转至封开县继续住院康复。

类似的跨省医保“一卡通”已经在梧州市工人医院、桂东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逐步推行。据梧州市工人医院统计,2013年1—8月肇庆市患者在该院住院治疗总费用已达537.68万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369.8万元。

“现在条件好了,转场路上冰箱、彩电都能用,再也不是‘黑帐房’了!”

——牧民索南才让骑着高头大马,赶着羊群高兴地说。

索南才让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瓦日杂村的牧民,村子就在公路边上。“转场”指的是牧民从一个草场赶着牲畜到另一个草场放牧的轮牧行走过程。时值10月初,正是牧民从夏秋草场返回冬春草场的转场时节。按当地气候等实际情况,牧民在夏秋草场的时间相对较短,而冬春草场上放牧的时间大概占去一年中的三分之一,因而冬春草场也是牧民们的定居点所在地。

以前每次转场都很困难,因为路不好走,都要人赶着羊走,80公里路要走三四天,现在柏油路都修好了,牧民们可以开着三轮车骑上汽车转场。

索南家三轮机动车上除了毡片、食物等生活用品外,太阳能电源、一台电视以及一台60升的冰箱,这是实施“金太阳工程”“草原新帐篷工程”等多项旨在改善偏远牧区生活条件的项目中发放的。现在太阳能电池里的电也用不完,能玩手机、看40多个频道的电视。

观点交锋:遗产税该不该征?

文·席敏 李亚楠

近日,关于“征收遗产税即将提上日程”的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尽管随后相关当事人称消息并不准确,但人们的关注度并没有随之烟消

遗产税征收时机到来了吗?

焦点:

继今年2月,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提出“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之后,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国务院参事刘桓透露,遗产税被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10月1日,国务院参事室的网站刊登刘桓的声明表示,9月以来,就遗产税问题未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媒体报道内容很不准确。尽管如此,“遗产税”还是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观点一:征收遗产税的时机早就到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我们国家的亿万富翁数量都已经赶上美国了,有各种方式富起来的群体,这是遗产税开征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关键是要不要下决心开始征收,现在国家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凸显,有了一批提前富起来的人,因此,开征遗产税对调节收入分配有重大意义。

观点二:征收条件尚不具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到没到征遗产税的时机,首先要搞清楚征遗产税的目的,

征收遗产税能否拉近贫富差距?

焦点:

舆论普遍将征收遗产税看做调节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了2003年至2012年十年间的基尼系数,最低为2004年的0.473,最高为2008年的0.491。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

观点一:不能将遗产税视作工具

刘尚希认为,我们要冷静看待遗产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不能认为征收遗产税就能解决收入差距大的问题,遗产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到底利弊哪个大,还有待观察。不能简单地“将遗产税”作为一个工具,认为这个东西只要用起来,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比较虚幻的思维。

观点二:遗产税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杨志勇说,遗产税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税收收入,我觉得遗产税相比于调节分配,可能鼓励大家做慈善,呼吁捐款的作用更突出,在这方面的象征

云散。

遗产税到底是否征收?何时征收?征收遗产税如何确保公平?专家学者们对此观点并不一致。

观点三:是否开征遗产税要立足国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认为,近些年来,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或大幅度降低税率,或暂停甚至取消遗产税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开征遗产税或遗产税税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与不开征或税率较低的国家地区相比,总是处于不利地位。财富从前者转移到后者的情况屡见不鲜。遗产税要有效发挥在调节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不能不面对遗产税的这些动向,同时需立足国情。

记者点评:

税收是富民之本,强国之基。开征一个新的税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否征收遗产税首先要考虑其是否利于国强民富,这不仅要立足国情,还要充分聆听民意,需在增加税收和保障百姓增收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

观点二:遗产税税率有待考证

杨志勇认为,遗产税调节力度的大小也是需要考量的问题,这涉及起征点和税负选择问题。从加大调节力度的角度考虑,设置累进税制且较高的税率体系可能更为合适,但从全球遗产税制的演变趋

观点三:遗产税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

意义更明显。遗产税的作用是促进社会公平,但开征遗产税也要防止新的不公平问题出现。

观点一:征收范围难以确定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潘明星认为,开征遗产税的关键是可行性。征收遗产税要求国家对公民个人“遗产”有很清晰的界定和掌控,包括公民的婚姻家庭情况、房产、金融资产、公司股权、境外财产,甚至古玩字画等都要在掌控之中,需要建立全国联网的体系,完善这些就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较长时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遗产税想征收就很困难。

观点二:征收范围难以确定

增加税收不是开征遗产税的主要目的,也不能完全指望利用遗产税去平衡收入差距。当前,更紧迫的是需要消除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国企民企之间存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征收范围、税率如何确定?

焦点:

一项新的税收制度从酝酿到出炉,总是要经历反复调研和思量,尤其是牵涉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是难以一蹴而就。目前社会上围绕遗产税开征的可行性也存在很多争议。那么,即便是开征遗产税,又面临哪些难点?

观点一:征收范围难以确定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潘明星认为,开征遗产税的关键是可行性。征收遗产税要求国家对公民个人“遗产”有很清晰的界定和掌控,包括公民的婚姻家庭情况、房产、金融资产、公司股权、境外财产,甚至古玩字画等都要在掌控之中,需要建立全国联网的体系,完善这些就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较长时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遗产税想征收就很困难。

观点二:遗产税税率有待考证

杨志勇认为,遗产税调节力度的大小也是需要考量的问题,这涉及起征点和税负选择问题。从加大调节力度的角度考虑,设置累进税制且较高的税率体系可能更为合适,但从全球遗产税制的演变趋

势来看,若设定过高的税负水平,结果又可能适得其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资本外逃。因此,若征收遗产税应考虑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设置合适的税负水平。

观点三:确定免征额需严格考证

刘浩说,遗产税首先是富人税,国外一百个遗产继承人,也就是两三个人需要纳税,绝大多数人都够不上缴税的数额。我国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作为分配政策的既定目标,因此中等及以下家庭的遗产赠与不应在课税之列。在我国大城市,许多人都觉得一套房就值好几十万,其实,这可能只是特定时期的特殊情况。国外在征税时,对于地价异常引起的税负加重也是有免除方法的。至于遗产税的免征额和征收比例恐怕要在掌握更全面、更详尽的财产状况后才能讨论。

记者点评:

开征一个新税种不仅要考虑公平公正,还要充分论证其可行性。这需要结合我国收入分配情况和财产评估实际,不仅要从小处着眼,还要从细微处着手。唯如此,方能经得起实践考验。(据新华社)

别让中试环节“卡”住科技成果转化的“脖子”

文·本报记者 林莉君

科技成果转化难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田静的话——“中间试验环节的缺失是造成科技成果转化不力、科技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原因”,为这一老问题注入了新答案。

近日,北京工业大学、民盟北京市委主办的“第三届首都产学研高层论坛”上,田静在做题为“中间试验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报告时指出:有研究表明,科技成果经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而未经过中试的科研成果只有30%能转化。科研成果完成中试后,其技术成熟度可达8级以上,有资金实力的企业能直接投入生产。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有一项甲醇制烯烃技术与间接法煤制油技术,在我国未来的煤代油战略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与企业的合作,他们完成了一系列规模化的中间性试验。现在卖出一套设备收取的专利费就高达1.2亿元。目前,他们已经占有我国甲醇制烯烃产业50%以上的市场,“十二五”期间预计将达

到80%。”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田静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中试环节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重要作用。

在田静看来,中间试验是科技成果经过原理实验、小样或横样实验的实验室阶段验证,转化为可以进行工业化、商业化生产并推广应用的过程中,必须完成的规模化、批量化、系统化的实验验证过程。

既然中试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支撑起这一关键环节呢?“中试所需要的人才队伍、资金规模、实验装置、试验场地等,一般的科研项目,中小企业承受不了。在发达国家,中试都由风险投资或有实力的大企业来完成。而在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真正的风险投资,也没有愿意承担大风险的规模企业,这需要政府部门牵头来完成这件事。”田静分析。

2008年—2010年,财政部与中科院合作,开展了先进设备的研发试点。“过程工程研究所有一项坚持多年的多尺度粒子算法研究,财政部自2009年起支持他们创新性地使用国际上新发展起来的GPU(图形处理器)芯片,配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算

法结构,短短两年,用不到两亿元的成本,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了单精度600亿次次的超算能力建设和初步应用,当时,这一成果还引领我国的超级计算机登上国际超算的巅峰。”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田静说:“通过适当财力的支持,在我们普遍缺失的核心关键设备研制环节,完全大有可为。”

但并不是有钱就能让成果顺利完成的,中试,走向产业化。“不少政府部门尝试性地安排了一些中间试验或者示范工程项目,但是却把示范应用研究当成工程项目管理,甚至采用招投标的操作方式,价低者中标。这种做法导致项目承担单位利益当先,完成工程即算成功,根本不考虑有没有真正解决转化应用中的问题。”田静遗憾地表示。

针对我国当前科技工作的特点,田静建议,由政府牵头,设立转化基金,梳理出一批在科研单位或大学已经完成实验室研究,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瞻性技术成果,与企业一起,筹集资金,完成中间试验,并从后期生产和推广中获得回报。

“能效渔业”或解淡水养殖与环境难题

文·本报记者 张林军

2004年,杨品红教授首次提出了“能效渔业”的理念。

所谓能效渔业,是指以现代生态学理论为依据,以水域生态环境现存能量为基础,根据水域中能量特点及原水生态系统中特定食物网结构和功能特点而设计的一种生物能量转化生态控制技术。该理论在实施过程中主要通过人工干预和调控水体中的氮、磷等含量,改善氮、磷比例关系,使其通过不同消费层次的水产生物转化为人类或陆生动物的食物或饲料,从而达到在保护水生态系统的同时,充分利用水域渔产潜力和提升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的多重目的,从而达到“鱼—水—生态”和谐共处。

据介绍,目前我国采用的多是池塘养殖、网箱养殖、网围养殖和大水面养殖与增殖等淡水鱼养殖方式,且主要以个体为主,面积小,缺乏大型的养殖区,如我国淡水鱼养殖区产值超过5亿元的仅大湖股份一家。传统渔业经营方式无法适应现代化作业,无法做到精准投喂与科学管理,也无力应对水生动物流行病、水体污

染等带来的新挑战,这是目前我国淡水渔业发展遭遇的最大瓶颈。专家认为,如果实施淡水渔业运行方式的彻底转变,并结合实施能效渔业,不但能有效解决现有局面,而且还能够彻底突破淡水渔业发展的瓶颈这个难题。

“能效渔业的实质其实是按需投入,首先确定放养模式与品种,再根据品种、产量、能耗等计算出所需的总能量,测算水体自身所含有的能量以外,要实现这样的产出目标,还需要补充多少能量。然后根据所得数据对缺少的能量进行相应补充。”杨品红表示,能效渔业综合考虑了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因素,在配比恰当的情况下,不仅能实现最大效益,降低养殖成本,还能保证鱼类健康成长。在第二届中国湖泊论坛上,杨品红以“能效渔业”为内容作了题为“内陆湖泊的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前景”的发言,被专家认为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模式,为我国未来淡水渔业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一条新路。目前,“能效渔业”已经在湖南洞庭湖流域进行试点推广。